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2/29  
13 February 1992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12

在世界任何地区，特别是在殖民地和其他未独立国家和  
领土上人权和基本自由遭受侵犯的问题

## 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的合作

## 秘书长的说明

## 目 录

	<u>段 次</u>	<u>页 次</u>
导 言.....	1 - 2	2
一、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1/70号决议 收到的资料.....	3 - 11	3
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采取的行动.....	12 - 19	5

## 附 件

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收到并处理的关于恐吓和报复的指控 .....	8
---------------------------------	---

##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在第四十六届会议上通过了第1990/76号决议，题为“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的合作”。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再次提及，个人和团体应能在不担心受到恐吓和报复的情况下没有顾虑地借助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或各项人权文书确定的各种程序提请对指称侵犯人权的注意。委员会对于联合国机构知悉有个人和团体在同联合国人权机构或条约机构的代表合作前后受到骚扰、虐待、拘留、监禁或其他种种困难的事件表示关注，对于这些个人的亲属或亲人据称也受到类似对待表示关注。委员会还对失踪人士的亲人通过适当渠道设法澄清受难者命运或下落时其本人或其所属单位据称经常受到打击报复表示关注。委员会在该决议中要求人权机构的所有代表向人权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报告侵犯人权事件时在其职权范围内采取紧急措施，防止恐吓或报复的发生并在他们提交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委员会还请秘书长将任何适当来源提供的关于对侵犯人权行为见证人或受害者打击报复的资料转交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

2. 委员会在第四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了第1991/70号决议，其中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的行动恐吓或报复打击那些设法同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代表进行合作、或设法援引联合国主持拟订的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程序的人士和团体，并请所有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以及监测人权遵守情况的条约机构按其职权继续采取紧急措施，防止联合国人权程序的引用受到任何阻碍。此外，委员会还要求这些代表和条约监测机构在其提交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或大会的报告中提到指称援引联合国人权程序受恐吓、报复和阻碍的事件，同时报道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委员会还请秘书长向委员会第四十八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载述从所有有关来源收到的关于违反人权行为见证人或受害者指称受报复打击的任何消息。

## 一、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1/70号决议收到的资料

3. 根据第1991/70号决议收到的资料涉及的情况种类甚多，有的是因求助于或设法求助于联合国人权程序而遭到报复，有的是恐吓他们不得这样做。这方面特别提到侵犯人权受害者的亲属、他们的律师、参与司法工作的官员、协助法官调查案件的专家、人权组织成员、社会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当地社区领导人和成员、以及参加或支持社区人权活动的神职人员。在一些情况下，人权机构代表根据各自议事规则或工作方法为保护这些人采取了行动。关于采取行动的叙述见下节和本报告附件。采取行动的情况都是因为恐吓或报复的受害者、其亲属、代表或某一为之出面的非政府组织向联合国人权代表提出了保护的请求。

4. 除关于保护的具体请求外，还收到了非政府组织发来的关于某一具体国家发生的或与某些人有关的恐吓或报复的报告。

5. 国际法律工作者委员会争取法官和律师独立地位中心和律师争取人权委员会提供了关于处理侵犯人权案件的法官和律师受到打击和骚扰及迫害的出版物。这两个组织都着重指出了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关于律师的作用的基本原则》一事的重要性，其中除其他外提出：社会的一切群体都应能有效地求助于法律援助；被告求助于自行选择的律师和法律援助的权利；律师在不担心压制或迫害的前提下充当委托人代表或承接案件的权利；律师为其与委托人的通信保密的义务，包括拒绝就此类事项作证的权利。收到的报告涉及发生在64个国家的500多个有关法官和律师受报复的案件，报复的原因是进行了捍卫人权的活动、代表侵犯人权受害者出庭、对政府作出的影响人权的决定或对政府官员的侵犯人权行为公开发表了意见，或是通过法律行动使侵犯人权者受到法律制裁。一些案件中，报复的形式是杀害律师或法官，或是对其人身进行袭击或破坏其财产。另一些报复的形式是逮捕、拘留或在拘留中施以酷刑或其他有辱人格待遇，或是行政措施，如不许办理某一案件或解除职务，以及其他“纪律”措施。就报告中提到的一些案件而言，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代表收到了关于保护的请求。对这些案件采取的行动反映在本报告附件中。

6. 大赦国际在一份题为“保健人员：侵犯人权的受害者”的报告中提到一些情况，据称军队或安全部队把在农村地区行医或从事社区保健工作视为与颠覆和政治反对活动有联系。报告中提到一些医生和精神病医师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遭到拘留乃至暗杀，这是因为他们谴责了酷刑或帮助了酷刑受害者及其亲属而受到的报复。据报告称，保健人员因忠实于自己的道义和职业义务而受到这种惩罚，而这些

义务均体现在一些职业标准、国际宣言和人道主义条约之中。

7. 此外还收到大赦国际和地方人权组织发来的有关资料，称1991年5月和6月份在萨尔瓦多的群众组织成员、群众团体成员和外籍工人大批受到死亡威胁。具体而言，据称这些人受到死亡威胁是因为他们可能要与联合国赴萨尔瓦多观察团(ONUSAL)合作和联系。成员受到威胁和恐吓的团体还有基督教会救助萨尔瓦多流离失所者委员会(Comité Cristiano Pro Desplazados de El Salvador)和萨尔瓦多政治犯及失踪者亲属委员会(Comité de Familiares Pro-Libertad de Presos y Desaparecidos Políticos de El Salvador)。

8. 此外还收到了其他与第1991/70号决议有关的报告，分别来自：大赦国际、美洲人权监督组织、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洪都拉斯捍卫人权委员会、赫尔辛基人权监督组织、秘鲁全国人权协调机构，以及医生争取人权组织，这些报告分别叙述了一个具体国家发生的或与某一具体案件有关的恐吓和报复事件，可向秘书处索取查阅。

9. 从其中的一些报告可以看出，在某些国家，由于举报草率处决、失踪、酷刑或其他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很危险，致使人们不敢向当局谴责此类侵犯。据说试图监督侵犯人权事件或致力于记录政府部队滥用权力情况的人往往受到恐吓运动的打击。还有报告提到，亲属因受到死亡威胁而不敢再要求移出在秘密墓地找到的尸体，对于应司法部门请求参加移尸的外籍法医专家也施加威胁，阻挠移尸。

10. 据收到的资料称，在一些国家，经常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报告的人权组织被当局定为“叛国组织”，或被控与颠覆性武装团体有牵联，原因是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如批评对制造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人给予赦免的政策，或是因为公开谴责政府部队的滥用权力。还有报告称，在一些据说发生大规模恐吓或报复行为的国家，主张执行人权标准或为减轻侵犯人权受害者或其亲属痛苦而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被视为参与颠覆活动或非难军队或安全部队的反颠覆活动。据报受到同样对待的还有公开批评没有有效的内部办法为侵犯人权的受害者提供补救，或是公开批评当局采取措施保证被认明的制造侵犯人权事件的人不受惩处。特别提请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严重情况：行刑队或准军事团体在政府默许下行事，因为这些团体经常以法外处决的形式对被指认为反对政府或其反颠覆政策的人实行报复。

11. 在另一些国家，据称恐吓或报复行为的形式是不断骚扰(如：被警察局传讯、警告停止活动、威胁拘留)、拘留、迫害主张促进人权的组织的领导人或成员并破坏他们的名誉。

## 二、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采取的行动

### A. 人权事务委员会

12. 人权事务委员会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监督机构，过去已对向其发文的人士受到报复和恐吓的问题发表过意见。

13. 委员会在1987年4月3日的一项决定 (CCPR/C/29/D/155/1983) 中关切地注意到：

“根据该缔约国提供的资料来看，开除 Eric Hammel 的决定似与他为向人权事务委员会作出陈述的人充当代表一事有关联。若确实如此，则委员会认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排斥任何为呈文请委员会按任择议定书审议者充当法律顾问的人是不合情理的，也不符合这些文书的精神。”

此外，委员会在1989年的一项决定 (CCPR/C/37/D/241/1987) 中强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排斥任何按任择议定书向委员会呈文的人是不合情理的，也不符合这些文书。事实上，若此类指控被确证属实，即表明一缔约国严重违反其在公约和任择议定书之下的义务。”

### B. 人权委员会的专题机制

#### 1.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14.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报告说，根据人权委员会第1991/70和1991/41号决议，工作组决定对下列任何案件采取行动(“及时干预”)：报告或调查与失踪有关案件或情况的个人或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遭受恐吓或报复的案件，以及求助于联合国人权程序的原因是受到恐吓或报复的案件。采取此类行动的条件是有关个人或与工作组有工作关系的某一非政府组织提出请求，或是对工作组采取行动是否符合潜在受害者利益作出合理判断的某一非政府组织提出请求 (见E/CN.4/1992/18, 第34段)。

15. 1991年，工作组向下列各国政府发送了“及时干预”函件：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秘鲁。采取这一行动要保护的对象是失踪者

亲属、其组织成员、失踪事件的见证人或因报告或调查失踪案件或因公开谴责此类案件而受到威胁或打击的人。

## 2.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16.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采取了与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相似的“及时干预”程序。他在第1991/70号决议之下针对两个据报发生在土耳其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案件采取了行动（见E/CN.4/1992/17）。

## 3. 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17. 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就第1991/70号决议范围内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的情况向有关政府发送过一些紧急信函。一般来说，特别报告员在采取行动前都收到了关于从情况来看某人生命或身体健全有危险的死亡威胁、攻击或其他形式恐吓或报复的报告。在所有情况下，特别报告员都提请政府注意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89年5月24日第1989/65号决议所附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草率处决原则第4段，行文如下：

“应保证通过司法或其他手段有效保护有遭法外、任意或草率处决危险的个人和团体，包括受到死亡威胁的个人和团体”。

18. 此外，特别报告员还提及第1991/70号决议，并要求了解政府采取了什么措施来保护他在转交该政府函电中提及的个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并请政府保证尊重人权委员会第1991/70号决议的规定。1991年，特别报告员遵照第1991/70号决议就据称发生在下列国家的案件采取了行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印度、巴拉圭、菲律宾、南非、斯里兰卡、土耳其（见E/CN.4/1992/20）。

## C. 人权委员会国别情况问题代表

19. 人权委员会一些报告具体国家情况的特别报告员、特别代表或专家就受害者、亲属或为之出面的组织提请其注意的具体案件与有关国家政府作了交涉。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在报告中提到有关指控，据这些指控称，某些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人或与他们积极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因捍卫人权的活动而受到严重的恐吓或报复。就

1991年而言，可提及下列在本报告完成时已出的报告：

- (a) 特别代表关于古巴人权情况的报告 (E/CN.4/1992/27)；
- (b) 特别代表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的报告 (E/CN.4/1992/34)；
- (c) 独立专家关于危地马拉人权情况的报告 (E/CN.4/1992/5)。

这些报告的有关部分载于附件中。

## 附 件

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收到并处理的关于恐吓和报复的指控

A. 被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  
(见文件 E/CN.4/1992/18)

### 中 国

Rinzin Dolkar, 14岁, 据报每日在家中受到警官的威胁, 警官对她说, 因为她报告了其父及三个兄弟在西藏的家中被捕及随后被拘押一事, 她将受到监禁(第83段)。

### 哥伦比亚

Libardo González 和 Elicer Mercado, Turbo 区 Puerto Bello 41位农民群体成员的亲属(据报被准军事团体绑架, 目前仍下落不明), 据报此二人分别于1991年6月29日和7月9日被便衣武装人员杀害。据说他们被杀是报复, 也是警告41位农民的亲属停止调查这些失踪事件(第94段)。

### 厄瓜多尔

Hugo Efrain España Torres, 退职警官, 两名被警方拘押青年失踪事件的关键见证人, 此人因调查这些失踪事件而被关押在监狱中, 据报1991年10月有人试图毒死他(第118段)。

### 危地马拉

1. 危地马拉一些多年来向工作组提供资料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出席了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 这些组织包括: 互助小组(GAM)、人权研讨、研究与促进中心(CIEPRODH)、民族社区理事会“Rumujel Junam”以及大学生联合会(AEU)。他们报告说, 由于他们所在组织的成员过去曾被据认为与官方部队有联系的人杀害, 而且

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离开危地马拉前受到威胁，因此他们担心回国时生命难保(第152、158、159段)。

2. Nineth de García, 互助小组领导人之一, 该组织是危地马拉失踪者亲属组织, 据报她一连几周接到匿名电话, 对她提出死亡威胁, 命令她不得再公开揭发危地马拉的失踪事件和在该国发现的秘密墓地。她报告说, 有人骑摩托车在危地马拉市街上跟踪她(第159段)。

3. 一个包括本国和国际法医人类学家的小组, 为一批失踪者亲属提供专门服务, 这些亲属希望能验明在基切省 Chichicastenango 市 Chantalá 的一外秘密墓地发现的遗体身份, 他们认为这些可能是他们失踪亲属的遗体。外国专家与为危地马拉司法部门工作的本国法医合作。他们成功地验明了某些遗体的身份, 并确证这些人遭到草率处决。他们的工作因外国法医专家和受害者亲属遭到民防巡逻队的死亡威胁而中断, 民防巡逻队试图以此阻挠移尸(第161段)。

### 洪都拉斯

Marco Tulio Hernández, 一位失踪者的兄弟, 洪都拉斯失踪被拘者亲属委员会主席之子, 1991年7月在家乡 San Pedro Sula 镇被杀(第174段)。

### 秘 鲁

1. Augusto Zúñiga Paz, 利马人权委员会 (COMISEDH) 法律事务处负责人, 为 Ernesto R. Castillo Páez (据报1990年10月被警方拘留随后失踪的学生) 亲属担任法律顾问, 承办的是人身保护诉讼, 原先由利马的两个法庭予以维持, 后被最高法院取消。看来 Zúñiga 博士因过问 Ernesto Castillo Paez 案而受到死亡威胁。他在向法庭就此案作口头陈述前曾将受威胁事告知最高法院。1991年3月15日, 有人将一个大信封送进 COMISEDH 办事处, 写明交 Zúñiga 博士收。据称信封上有一印记, 由此可看出是秘鲁总统秘书办公室发出的。Zúñiga 博士开启信封时, 信封中的爆炸装置引爆, 炸去了他的左前臂和手。他在 COMISEDH 总部的办公室受到很大破坏(第287段)。

政府在答复中称, 已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 Zúñiga 博士和 COMISEDH 办公室被袭击一事, 同时已采取措施保护 Zúñiga Paz 博士的生命和安全 (第291段)。

2. 1991年7月4日，万卡韦利卡省 Santa Barbara 农民社区的15名男子、妇女和未成年人被配合民防巡逻队行动的士兵拘留。有关方面从未承认这些人被拘之事。7月11日，其中一位失踪少年的亲属声称在一个废矿中找到了这个少年的尸体，并称在附近看到另一些尸体。此事报告了万卡韦利卡省检查官和一位法官。7月14日，Santa Barbara 社区成员组成的代表团想到该矿看一下，但被军事人员阻止不得接近。7月18日，一位法官在省检查官和警方、武装部队和新闻界成员的陪同下进入该矿，发现多具遗体、衣物、用过的爆炸物和其他物件。7月18日此一调查过程中，Santa Barbara 社区的23位成员接近该矿时被军方拘留，其中21位随后被释。一些非政府组织表示担心报告 Santa Barbara 社区15位成员被拘随后失踪的人以及拘留和草率处决的见证人的生命有危险，尤其是因为曾发生过1989年 Cayara 农民社区成员被杀的一些见证人遭到谋杀和失踪的事件(第278段)。

政府报告了对侵犯 Santa Barbara 社区成员人权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并提供证据表明肇事者是第43反颠覆营巡逻队；其中的一些成员在陆军第二司法区战争理事会被控犯有杀人罪，强奸罪和其他侵犯人身及财产罪。关于对见证人的保护，政府称，电报提及的 Cayara 案不能视为引起对 Santa Barbara 案见证人生命和人身安全担忧的先例，因为在 Cayara 案调查之后并无针对武装部队成员的指控。此外，对指称暗杀见证人事进行的调查也未得出定论(1991年11月1日和12月2日普通照会)。

3. Juan Arnaldo Salomé Adauto、Víctor Luis Salomé Adauto 和 Rodolfo Alberto Salomé Adauto 据报自 Juan Arnaldo 从军营中逃出后面临危险，此人在该军营被秘而不宣地关押了一个半月(1991年4月24日至6月10日)。据报告称，他逃出后曾到检查长办公室(Ministerio Público)就秘而不宣被拘和受酷刑一事作证，并报告了其他同他一样被拘押在军营的人的姓名。报告还称他逃离军营后，他的住所被便衣武装人员搜查，他的弟弟 Víctor Luis 和 Rodolfo Alberto 都遭到殴打，这两人都是少年。他们担心由于 Juan Arnaldo 出面作证一事，自己和 Juan Arnaldo 都可能受到报复。

B. 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  
(见文件E/CN.4/1992/1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Massoud Afravi, 旨在人权委员会特别代表1990年1月访问伊朗时向其提供证词, 据报1990年1月30日在家中被捕, 关押在德黑兰附近 Nikonam 街 Shahr Rey 监狱, 据称在狱中受到酷刑, 后被送入Pars医院医治。据报告称, 他从医院中逃出, 最终逃离了伊朗。一份关于他左上臂有一大伤疤的医检证书据称与其关于所受酷刑的报告是一致的(第24、122段)。

土耳其

Yavus Binbay, 凡省土耳其人权协会主席和该组织在全国一级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经常报告所在地区的人权情况, 据称1989年4月和1990年3月在凡城受到安全部成员的威胁。据报在受到威胁后他遭遇两次他认为故意对他搞的车祸。另外据报他还受到MIT(安全部队)成员和安全部当地成员的不间断的监视。鉴于他以前曾被关押和遭受酷刑, 有人表示担心他可能再次被捕和遭到虐待(第23, 245段)。

政府答复称, 凡城的官方律师曾请Binbay先生到其办事处会面。会见中Binbay先生确认了联合国所收报告中提到的指称, 并表示他认为威胁来自“权势集团”。然而, 由于他在车祸中并未受伤, 因此未向主管当局报告(1991年12月20日信件)。

草率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  
(见文件E/CN.4/1992/30)

阿根廷

Bonafini 夫人和 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的其他一些成员自1991年2月以来多次受到死亡威胁。该组织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地在1991年3月2日至6月4日之间曾被人四度闯入, 窃去了该组织的设备、金钱和记录。收到的报告称, 据认为政府部队制造了对该组织的骚扰和威胁(第482段)。

## 巴西

1. Ricardo Rezende 神父，前 *Conseição da Araguaia* 牧师土地委员会 (*Commisão Pastoral da Terra* (CPT)) 协调员，农村工会成员，在电话中受到死亡威胁，原因是从事协助和支持农村工人及其工会的活动。该委员会向联合国人权代表提供资料(第65段)。

政府答复称，司法部已请帕拉州州长保证据称受到威胁的人的人身安全(第78(c)段)。

2. Tania Maria Saller Moreira, 里约热内卢州 *Duque de Caixas* 检查官，一段时间以来在工作地点和家里受到电话中打来的死亡威胁：1991年2月以来更为增多。她在里约热内卢州很有声望，因为对据称杀害了一些少年和青年的行刑队成员提出了诉讼，死亡威胁大增时正在起诉其中的一人，据称是某行刑队的负责人(第78(a)段)。

政府答复称，司法部已建议由联邦警察在Tania Saller Moreira前往 *Duque de Caixas* 法院和返回的途中给予保护，她现已得到这种保护(第78(a)段)。

3. Ladislao da Silva 神父，巴西东北部皮奥伊州 *Esperantina* 教区神父, *Manuel Aparecido Monteiro* 神父，巴伊亚州 *Monte Santo* 教区神父，以及 *Maria Conceição Neves Barbosa*, 巴伊亚州 *Bonfim* 附近 *Land Pastoral* 委员会律师，据称受到死亡威胁和其他形式的恐吓(第70段)。

## 哥伦比亚

1. Mónica Sánchez Arrieta, 律师，过去六年来致力于在安蒂奥基亚省 *Medellín* 从事捍卫人权的工作，据称1991年2月5日接到电话指责她为游击队战士辩护并对她发出死亡威胁。两天后，据称她收到一份日期为2月10日的“*Sufragio*”(请她参加自己的葬礼的邀请书)。据报告称，Sánchez Arrieta女士曾为声援政治犯委员会(CSPP)律师、出庭为政治犯辩护，并且调查安全部队成员涉嫌参与的法外处决、失踪和酷刑案件。据称受威胁事已上报安蒂奥基亚区检查官、司法部长办公厅人权委员会以及全国刑事调查局人权委员会(第99段)。

政府答复称，总统人权事务顾问已调查了此案并与 Mónica Sanchez Arrieta 取得了联系，说她从未请求保护，只是将受威胁事报告了安全事务行政部(DAS)，该部正在调查(第120、126(b)段)。

2. Elkin de Jesús López Ospina, 桑坦德省北部农民领袖和 Tibú 市捍卫、保护和促进人权委员会成员, 据报1991年4月受到一个准军事团体发出的死亡威胁, 该团体被怀疑与军方有联系。据说他于1991年4月18日向市检查官报告了这些事件(第103段)。

政府答复说, 据安全事务行政部(DAS)所作调查, 有证据表明López Ospina 先生受到死亡威胁。然而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因为据称他在当局不了解的地方接受治疗(第113(d)段)。

3. Eduardo Umaña Mendoza, 律师, 为1991年9月在昆迪纳马卡省 Fuagasuga 区一个家族被暗杀的几个成员的亲属充当法律顾问, 此人曾与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合作, 1991年10月受到死亡威胁。1991年11月, 此人再次受到威胁, 尽管政府已为之提供保护。1991年9月被杀人员的亲属也因提出诉讼要求调查此案而受到威胁。(第10段)。

政府答复说, 经Umaña Mendoza 先生同意, 由全国刑事调查局和安全事务行政部(DAS) 负责为他提供保护。官方为这位律师提供了陪同人员和专用车辆。DAS 正在对威胁进行调查(第122段)。

4. Peña Barros 和 Antury , 两位律师, 卡利地区声援政治犯委员会成员, 收到一份写有死亡威胁文字的信, 看来是因为他们调查1991年一位工会领袖被暗杀一事。据报告称, 武装部队承认对此项罪行有责任(第111段)。

## 古 巴

1. Ariberto del Toro Argote 和 Miriam Zaragoza Perez, 人权活动家, 据报收到死亡威胁, 据称是因为从事与古巴争取人权委员会 (CCPDH) 有关的活动(第133段)。

## 萨尔瓦多

1. Armando Salazar, 萨尔瓦多争取释放政治犯和失踪者亲属委员会 “Marianel García Villas” (CODEFAM) 主席, Guadalupe Mejía, 副主席, 以及 Fidelina Alvarenga、Margarita Aleman、Cristina Cardoza 和 Mauricio Martínez, 该非政府组织成员(该组织经常向联合国人权机构代表提供资料), 据报1991年5月接到一个自称为“死亡天使”的男子打来的匿名电话。该人提到六个领

导成员的姓名，并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哪里”。报告说其中四人曾被拘留，有一个人曾一度失踪(第145段)。

2. Medardo Gómez, 路德教派主教，并且是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有咨商地位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国际反酷刑联合会(IAAT)的主席，据报1991年7月受到萨尔瓦多反共阵线(PAS)的死亡威胁，该阵线以前曾声称要针对主张通过谈判争取萨尔瓦多实现和平的人发动一场血腥的内战(第147段)。

3. Mirtala López, 萨尔瓦多基督教保护流离失所者委员会(CRIPDES)成员，该委员会经常向联合国人权代表提供资料，1991年9月收到萨尔瓦多反共阵线(FAS)的两封信，威胁要消灭她。López 夫人曾于1989年4月被警察拘留，同时被拘留的还有 CRIPDES 的其他七位成员。据报告称，他们在拘押中都受过酷刑，后来获释，未提罪名或受审判(第155段)。

### 危地马拉

1. Amilcar Méndez, 民族社区理事会“Runujel Junam”(CERJ)领导人，1991年4月和5月在家中接到匿名电话威胁。打电话的人说 Mendez 先生逃脱不掉，他的妻子和孩子也逃不了。据称 CERJ 自成立以来一直是各种侵犯人权事件的对象。自1990年3月以来，已知至少有八个成员在据报官方涉嫌参与的情况下被杀。自1991年1月以来，CERJ 的三个成员和 CERJ 成员的三个亲属被杀。此外，据称更多的 CERJ 成员受到安全部队成员或其指挥下的人的恐吓和威胁。最近的一起杀害 CERJ 成员事件是1991年4月14日发生的，发生在基切省 Zacualpa 的 Potrero Viejo，被害者是 Camilo Ajqui Jimon(第201段)。

2. 1991年5月，CERJ 另一位成员 Mignel Sucuqui Mejía 的家被民防巡逻队包围，巡逻队员闯入盘问 Sucuqui Mejía 先生在什么地方。当巡逻队长得知他不在时，便扬言如报告受威胁事即要杀害 Mejía 先生的妻子和全家(第198段)。

政府答复称，主管当局正在调查对Amilcar Méndez Urizar 和 Miguel Sucuqui Mejía 威胁的事。关于 Mendez Urizar 先生一案，一个经指认制造威胁的人已被拘留。此外，已为这两人提供了保护，但 Méndez Urizar 先生已决定与家人出国(第237段)。

3. Mario Salazar 和 Julio López, 两位教育工作者，为 Casa Alianza (盟约之家)工作，该组织照料危地马拉的街头儿童，经常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报告，据称两人都受到便衣警察用火器进行的威胁。据报告称，1991年1月26日上午11时

许，两位教育工作者正在辅导危地马拉城的一群儿童，两个身穿便衣的人走近前来，用武器对准 López 先生的头部和一个名叫 José Luis González 的男孩头部，并将两位教育工作者带到国家警察总部，孩子们目睹他们被带进去。据 Salazar 先生和 López 先生称，两人都受到警方人员的盘问和辱骂，并指责他们制造问题，后又要他们签署一份声称被拘纯属误会的声明。针对此事，受害者似已提交报告，对滥用权力和绑架提出了控诉。报告的编写者对此一事件表示关注，特别是因为以前就发生过影响该组织成员的严重事件，诸如1989年10月 Rene Geovanny Soto García 被绑架和死亡一事，以及最近 Casa Alianza 主任 Bruce Harris 受到死亡威胁(第189,190段)。

4. Bruce Harris, Casa Alianza 执行主任，以及该机构的另一些工作人员受到死亡威胁，据称是安全部队所为。1991年7月，Casa Alianza 的建筑物两度受到枪击，开枪者驾一辆有着色玻璃车窗的蓝色汽车。还有报告称，自 Casa Alianza 成立以来，其法律事务所曾提请调查侵犯青少年人权的事件(共报告了39起此类侵犯案件，据称50个警方人员对此有责任)。为 Casa Alianza 工作的人和其向当局所报案件的见证人一再受到死亡威胁，竟致其中一人不得不出国(第189、205段)。

5. Carmen Reina 和 Otto Peralta，大学生联合会(AEU)领导人，曾出席人权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据称受到被认为与政府部队有联系的人的死亡威胁。他们在会见 Ministro de Gobernación 时报告了受威胁一事。这一事件尤其令人关注是因为自1989年以来 AEU 已有12位领导人失踪，同期还有另外七位领导人遭到草率处决。此外，AEU 的另外一些成员最近受到恐吓、迫害和威胁(第210段)。

6. 争取科学进一步协会 (AVANSCO) 主任、著名的人权工作者 Myrna Mack Chang 1990年9月被刀扎死亡，他的亲属和同事在1991年8月5日 José Miguel Merida Escobar 被暗杀后对自己的安全感到担心。Mérida Escobar 是国家警察刑事调查部凶杀调查科科长。他在被暗杀前不久提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Mack Chang 夫人被杀事件有政治动机，并有高级别军方人员参与。Mérida 先生被暗杀时正在准备向美洲人权委员会作证(第211段)。

7. Luis Ruiz Saquie 和基切省 Zaculpa 区 Tuanaja 互助小组(GAM) (危地马拉失踪者亲属组织，经常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的另外11位成员据报在上述地点受到民防巡逻队(PAC)成员的死亡威胁。GAM 的这12位成员报告说，他们目睹了 PAC 的 Santos Coj Rodríguez 和其他成员的侵犯人权行径，据称这些成员在1982年和1983年拷打和杀害过前者的亲属。1989年4月在 Tuanaja 的一处秘密墓地

找到了被害者的遗体，鉴于遗体的身份已经查明，亲属们正在要求由主管法庭调查此案。据报告称，Santos Coj Rodríguez 于1991年6月被逮捕，但据称已于1991年10月越狱潜逃(第229段)。

### 印 度

Reddy 先生，35岁，律师，Andhra Pradesh 公民自由委员会(与联合国人权机构合作的组织)地区分会召集人、地区律师协会秘书，1991年12月7日在家中被四名身份不明的人开枪打死，据报这些人乘坐的轻型摩托车上没有车牌。地区律师协会报告说，Reddy 先生曾因与政治活动者从事法律工作而受到警方威胁，律师协会曾要求该区区长出面制止警方骚扰 Reddy 先生(第264段)。

### 菲律宾

1. Romeo Capulong，人权律师，自由法律援助团(FLAG)成员，该组织经常为联合国人权程序提供资料，此人据报受到持武器者的恐吓，据信这些人与安全部队有联系。有人驾车跟踪Capulong 先生，据信跟踪者与军事情报部队有联系。1991年4月，Capulong 先生受到两名便衣武装人员恐吓，他们在诉讼中闯入法庭，要求Capulong先生为之辩护的人的陪同人员指出他。Capulong先生被指出后，这两名武装人员未受阻拦地离开了法庭。据见证人说，这两人驾一辆无牌号的本田牌红色摩托车离去。过去三年中至少有三位被害人权律师是被驾驶类似摩托车的人开枪打死的，这些人身穿便衣，身份不明(第452段)。

2. Tombo 先生，与自由法律援助团(FLAG)有联系的人权律师，据报1991年7月17日与两位同伴 Benedicto Pacheco 和 Roberto de Vera 在自己家中，晚间11时30分左右，Tombo 先生注意到一辆摩托车和一辆红色吉普车，分载两人驶过他家，旋即返回。两人从车上跳下，向 Pacheco 先生、Tombo 先生和 de Vera 先生开枪射击，持续近十分钟。Pacheco 先生左肘和踝部受伤；Tombo 先生右臂和腹部受伤；de Vera 先生右腿和臀部中弹。袭击的主要目标似为Tombo先生，他曾为政治犯和被控参加新人民军的人担任辩护律师。Tombo先生还担任家乡农民合作社的主席(第453段)。

3. Wilfred D. Asis，人权律师，FLAG 成员，1989年受到死亡威胁。Asis 先生当时作为辩护律师为六名被控与被取缔的菲律宾共产党(CCP)有牵联的人

辩护。这六个人被控的颠覆罪于1991年8月22日被推翻。1991年8月29日，Asis先生收到一个叫Guyong 的人的来信，该人声称代表民族民主阵线(NDF)。该信先是称赞Asis先生从事人权活动，接着却转而说他杀害过名叫Leo和Mike的两个人，正在被“调查”。该信最后向他表示“哀悼”，说他不久于世。1991年9月，Asis先生将其生命受威胁一事向菲律宾国家警方人员作了报告。据报一名警察长告诉他，菲律宾武装部队的一些人可能正在考虑“除掉他”。据报警察长还建议他向司法部长求助(第455段)。

4. 据称过去三年中至少有六位人权律师遭到法外处决。其中三人是FLAG成员。此外在这段时期内还有许多律师受到死亡威胁或其他恐吓。1991年，一位FLAG 律师Nerio Zamora 据报受到保和省警察厅长的死亡威胁(第454段)。

###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律师协会(该组织过去五年来一直向联合国人权机构提供资料)请D.H. Weerasiri 律师为被控犯有抢劫罪等罪名的请愿者出庭。Homagama 地方法院正在审理这些人的案件。据称警方对他发出死亡威胁，叫他不要在这些案件中出庭辩护。在斯里兰卡律师协会的请求下，Weerasiri 先生不顾威胁继续代表请愿者出庭。在分别向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提起人身保护请愿和关于基本权利遭受侵犯的请愿时，Weerasiri 先生再次被请代表请愿者在 Homagama 地方法院出庭。据称Weerasiri先生又一次被警方要求不要出庭为这些案件辩护。最后，在1991年8月底，Weerasiri先生在前往事务所途中受到袭击。Weerasiri先生曾正式向Homagama 警察局控告此一事件，但据称未得到任何反应(第493段)。

### 土耳其

Zubeyir Aydar先生，律师，土耳其人权协会(HRA)副主席，据报1989年初开始不断收到死亡威胁，原因是调查并发表了锡尔特附近存在所谓“屠夫之河”的细节，据称遭法外处决者的尸体被弃置在该处。据报当地军方长官威胁 Aydar先生说，有朝一日他的尸体也会出现在“屠夫之河”中。Aydar先生后又公布了三位被拘留者在锡尔特的 Findik 被关押时受酷刑而死亡的事，之后他又受到一系列死亡威胁。1989年9月，他在紧急立法之下被放逐到马拉蒂亚省；1990年7月对他又有一次放逐令，后被取消。还有报告称，Aydar的家人了解到政治警察成员要Tasli村的

五位村警杀害 Aydar先生。1991年8月22日，其中四名村警出现在锡尔特；据报有人看见他们走进警察总部。该日晚些时候，他们出现在 Aydar先生的事务所外面。同日，警方追查 Aydar先生的下落，有人告知警方他已出城。次日晚间，Aydar先生的事务所窗户被砸，当时事务所内没有人。1991年8月27日，据报便衣警官乘车来到事务所，车牌号是56AT321。当时唯一在场的只有13岁的Lokman Gunduz。据称警官扼住这个男孩的脖子要他说出 Zubeyir 和 Evin Aydar在什么地方。事发后不久，Aydar女士向当局报告了这起事件。她未得到答复。1991年8月27日和28日，又有人看见村警站在 Aydar先生的事务所外面(第546段)。

政府在所发答复中称，在人民劳动党(HEP)迪亚巴克尔省分部主席被伪装成警察的暗杀之后，Zubeyir Aydar故意散布声称他本人面临同样危险的消息。应当指出，Aydar先生是1991年10月20日大选中的候选人之一。此外，他并未告知锡尔特省当局受过任何死亡威胁(第549段)。

古巴人权情况特别代表  
(见文件E/CN.4/1992/27)

特别代表在提交人权委员会的报告(E/CN.4/1992/27，第21-24段)中提到据称因与1988年联合国赴古巴访问组联系而受到报复的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人权情况特别代表  
(见文件E/CN.4/1992/34)

特别代表在报告(第303段)中提到，他在伊朗监狱中会见的一些囚犯说，他们感到与特别代表交谈并不安全，因为以前见过特别代表的囚犯都说他们因申诉而受到报复，而且有一案还被判了比其他罪名相似的案件重得多的刑罚。

Kalami Mehrdad, Ali Akbar 之子，据报在特别代表1990年1月第一次访问伊朗时与之会见后被逮捕，1991年12月仍关押在 Bandar Lanqué 监狱(第368段)。

特别代表在会见伊朗政府的一位代表时将此案提请他注意，强调指出委员会在第1991/70号决议中促请各国政府不要以任何方式的行动恐吓或报复打击那些设法同联合国及其人权机构代表合作的人。

危地马拉人权情况独立专家  
(见文件E/CN.4/1992/5)

1. 专家在报告(第115至129段)中提到从一些向其提供资料的非政府组织收到的指控，涉及这些组织成员人权受到侵犯，包括草率处决、失踪、酷刑、任意逮捕、威胁和其他形式的恐吓。专家指出，危地马拉人权组织不断提出的批评不应被政府拒之不理，而应受到欢迎，因为通过这种批评可以修改和改善已在进行的活动及今后的战略。从这一观点出发，令人震惊和担忧的是前述人权组织在1991年受到沉重打击，许多成员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一状况的原因就在于仍然有许多人在思想上把根本变革内部政策的主张视为具有潜在的危险，因而是不合法和颠覆性的。

2. 专家在1991年10月访问危地马拉期间，在危地马拉人权检查官的陪同下访问了基切省Chajul市的Amache1村和Cabá村。代表团在飞往 Cabá途中与一架军用飞机和一架军用直升机相遇。他们抵达Cabá时了解到村民受到一驾军用飞机和一架军用直升机上的机枪射击，专家在村内时这两驾飞机仍在该村上空飞行(第54段)。

专家和人权检查官返回危地马拉城之后即发表了一项新闻公报，其中除其他外提出结论指出，村内平民和他们自己都面临在军方射击下丧生的危险，并强烈建议危地马拉文职当局和军事当局采取措施，防止发生此类威胁平民生命和安全的事件。专家在会见国防部长时表示，他认为发生袭击 Cabá事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访问前已通知了当局，包括军事当局。他还指出，村民没有武器，他在村内也没有看见武器。专家请国防部长调查此一事件，对有责任的人采取适当措施，并对他的请求作出正式答复。专家还就此一事件向危地马拉总统发了一封信件(第54、56段)。

共和国总统答复表示对Cabá事件很关注，并保证军方未曾并且也不会向平民滥行扫射，即便在暴力地区也一样。他还表示，已责令彻底调查此一事件，查明军用飞机当时扫射的目标是一个反叛团伙，这一团伙在距Cabá三公里处袭击一架军用直升机。总统还宣布已决定解除空军司令的职务(第58段)。

XX XX XX XX XX